



游牧与农耕的经济形态差异及经济地理上的分野，通常被视作理解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由于匈奴与两汉、柔然与北魏、突厥与隋唐，这样的二元关系贯穿了整个汉唐时期，故而以游牧—农耕关系来解释汉唐历史，业已成为经典的研究范式。然而，这一范式却忽略了汉武帝征匈奴以来，入塞且与汉人杂居的游牧民族的情况——他们同样深刻参与到中国历史进程中。

严昊所著的《胡马度阴山：中古华北山居族群丁零与稽胡》（以下简称《胡马度阴山》）关注迁居于塞内且未能成功建立政权的丁零与稽胡，则是对这一叙事模式的重要推进。

■刘雅君

北朝的政治脉络由此开启

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皇帝刘曜与后赵王石勒决战于洛阳，刘曜被俘，前赵军被斩首五万。次年，前赵亡国，太子、公卿、将校三千多人被杀，五部匈奴五千多人被坑杀。前赵的覆灭也被视作是五部匈奴的覆灭。

前赵及其前身汉国，皆由五部匈奴所建。五部匈奴是南匈奴与屠各匈奴的联合体。东汉末年，南匈奴被曹操分割，至魏晋时形成五部之制。同时，屠各匈奴迁徙至南匈奴之地，并完成对南匈奴的政治控制。屠各匈奴是汉武帝时期入塞的，贵族以刘为姓，自居为汉朝后裔。西晋八王之乱时，屠各领袖刘渊趁时局混乱建立汉国，并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刘邦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汉国在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一方面成为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先河，另一方面为中华文明认同树立了典范，十六国北朝的政治脉络由此而开启。

前赵覆灭后，五部匈奴再未以一个整体出现在史籍中。《胡马度阴山》则通过文献钩沉与田野工作，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看法。北魏前期，无论是作为汉赵国皇族的屠各刘氏，还是作为匈奴“四姓”的呼延氏、乔氏、卜氏、兰氏，都频繁见诸史籍及碑刻。此外，这一时期史籍中频繁出现的匈奴高氏与屠各王氏、郭氏、张氏，也都是稽胡的重要成员。可以说，南匈奴、屠各匈奴并未随着前赵的覆灭而灭亡，他们仍然生活在吕

山中北朝史的『隐形篇章』

梁山区和黄土高原。而且，随着赫连夏的灭亡，铁弗匈奴也加入了进来。这些居住在山区的匈奴人具有自身独特的信仰，即刘师佛崇拜（对名僧刘萨诃的崇信）。这一信仰，是吕梁山区的匈奴人区别于其他胡人的重要文化特征。

前秦时期，一个名叫刘康的西域胡人，诈称自己是前赵皇帝刘曜之子，从而得到吕梁山区的匈奴人的拥护。匈奴人聚集在汉国的故都平阳，举事反秦。前秦派出禁军予以镇压，匈奴人的复辟昙花一现。北魏兴起后，从后燕手中夺取并州，数千匈奴人随即便聚集在离石起事，其领导者为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离石是汉国的早期都城，匈奴



徐显秀墓壁画。 书中插图

人在此地起事，其政治寓意明确。这场起事也失败了，北魏道武帝派遣三千铁骑镇压，斩杀了呼延铁、俘获了张崇，并进山搜查余党。但北魏仍然未能掌控吕梁山区。天赐五年（408年），北魏大臣贾弼去温泉养病，在经过吕梁山区时被匈奴人劫掠，并送到汉国故都平阳。明元帝时期，离石、吐京匈奴在赫连夏的支持下起事反魏，阵斩永安侯慕容，俘虏会稽公刘洁。但匈奴人内部缺乏统一的组织，北魏在西河匈奴的支持下夺取吐京，镇压了这次起事。

北魏初年，西域胡人进入吕梁山区，让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神瑞二年（415年），白亚栗斯在上党起事，自称单于。单于是匈奴最高君主称号，而白亚栗斯是西域胡人，难以服众。匈奴人废黜白亚栗斯后，改立刘虎为王。在与北魏的对决中，刘虎部众被斩首万余人，被俘获十万余人。山区的匈奴人势力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太武帝时期，西河胡白龙起事，部众大概是匈奴人与西域胡的混合体，他们被北魏称为“山胡”。白龙以设伏的战法，将太武帝击落马下，几乎将其俘获。白龙起事后，其部众持续抵抗北魏达三年之久。随着西河胡的撤退与转进，五城、吐京等匈奴人聚集之地也被动员起来，在随后的十多年里间断性地举事反魏。

历史上著名的盖吴起事发生后，吕梁山区的匈奴人与关陇地区的山区民族联系起来，共同反抗北魏。这一事件也被视作稽胡族群形成的标志。由此，山居的稽胡群体，除了建立过汉赵国的南匈奴及屠各匈奴、建立过赫连夏的铁弗匈奴、建立过后赵的匈奴别部羯人之外，还包含了西域胡、羌，以及起源于东北的鲜卑、乌桓，入塞的高车等部族。对于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北魏以设置护军、镇戍等方式予以监管，同时逐步推行将之编户齐民化，特别是对于匈奴人聚集的离石，北魏先承袭后燕设置离石护军，太武帝以后又在此地设置离石镇。吐京地区则延续赫连夏设置吐京护军，后设吐京镇。北魏镇压盖吴起事后，加速了对吕梁等山区稽胡的编户齐民化进程，向其征发兵役、徭役，并征收税赋。山居稽胡应缴纳的实物税中有一种是被称为“胡女布”的粟特锦，其织法及图案由粟特人带来。也正是基于北魏的

这一纳税政策，上贡胡女布的族群被视作同一个民族共同体，稽胡的观念在制度层面得以确立。

十六国时期的第十七国

稽胡是以聚集于吕梁山的匈奴人为核心形成的族群，是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后形成的新的共同体。以此相对照，华北山居的丁零则是广义丁零中入塞的一支，他们以太行山区为据点。丁零是突厥语族群的共同称呼。汉武帝打击匈奴后，丁零人摆脱匈奴的控制，逐步南下入塞。其中有一支丁零定居河西走廊，翟氏为其大姓。东汉末年，董卓将由汉、匈奴、羌、丁零等组成的西北军队带入洛阳、长安。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河西的一些丁零人流入关东，被曹操安置在太行山东麓的定州，成为军户。西晋时期，河西丁零翟氏归属于铁弗匈奴。铁弗匈奴失败后，翟氏也进入到太行山东麓地区。太行山地区的丁零，除了来自河西走廊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洺阳、代郡，他们是两汉时期戍守幽州、并州边疆地区戍卒的后代。

西晋末年，匈奴人建立汉国，羯人石勒受到汉国的派遣，经略太行山以东地区。丁零翟氏发生了分裂，一部在翟鼠的率领下与石勒对抗，一部在翟斌的率领下与之合作。淝水之战后，翟斌是最早举起反秦旗帜的。翟斌率领丁零人加入到慕容垂的后燕政权中。后来翟斌叛燕被杀，丁零部众返回太行山东麓地区。在后燕的围剿下，丁零人在翟辽的率领下离开太行山东麓，迁徙至黄河北岸的黎阳，建立翟魏政权，后将都城迁至黄河南岸的滑台。倘若翟魏政权能够持续稳定地存在，它将是十六国之外的第十七国，丁零也会成为史书上“五胡”之外的第六胡。然而，在后燕的打击下，翟魏仅延续了四年，亡国君主翟钊投奔西燕而被杀。

北魏统治河北以后，每逢政局动荡，丁零均会参与时局并发挥巨大的政治能量。在后燕与北魏的政权交替期，丁零多次与河北地方势力合作反魏。东晋刘裕北伐，丁零予以响应，先后有翟猛雀与翟蜀的两次起事。丁零以太行山

区为大后方，战败则撤入山中，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后，又依托太行山出击北魏。正因如此，丁零的抗魏斗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北魏为此不得不入山搜检。入塞丁零最后一次在史籍中出现是孝文帝改革前夕，但其根据地已经转移至距离太行山区直线距离50公里的广阿泽，这表明丁零逐步丧失了其太行山根据地，由部族集团转变为北魏的编户齐民。

山居游牧族群的走向

在入塞游牧民族的历史中，稽胡与丁零具有典型性。与草原游牧民族不同，稽胡与丁零都选择了山居。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首选，而是政治发展失败之后的选择。南匈奴与屠各匈奴联合建立的汉赵国未能国祚长久，这是匈奴遗民固守吕梁山区的政治背景。丁零建立翟魏的尝试失败，也是丁零转向依托太行山区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缘由。吕梁山与太行山不同的地理环境，又影响了稽胡与丁零的不同发展趋向。

吕梁山位于黄土高原上，地势崎岖，具有相当的封闭性，这为南匈奴与屠各匈奴的族群凝聚提供了地理上的安全保障。赫连夏失败后，其主体族群铁弗匈奴也汇聚到这一群体中。吕梁山区的匈奴人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组织性，并形成了以刘师佛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纽带。随着西域胡的汇入，吕梁山区的匈奴人与其他地方的胡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最终在与北魏的对抗中形成了新的稽胡族群。太行山则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区位优势，尤其是其东麓与广表的河北平原相邻。入塞丁零聚居于此，与河北政局息息相关。十六国时期，丁零建立翟魏，遵循的也是入塞各民族共通的政治模式。可以说，相对于给小小说定位同样适用。入塞丁零聚居于此，与河北政局息息相关。十六国时期，丁零建立翟魏，遵循的也是入塞各民族共通的政治模式。可以说，相对于给小小说定位同样适用。入塞丁零聚居于此，与河北政局息息相关。十六国时期，丁零建立翟魏，遵循的也是入塞各民族共通的政治模式。可以说，相对于给小小说定位同样适用。

东西魏分立及隋唐时期，稽胡仍

然频繁起事。按《胡马度阴山》对稽胡起事的统计，其在前、后秦时期起事3次，北魏则有43次之多，东西魏及周齐时期为27次，隋唐亦有10次，由此可见稽胡政治军事能量之充沛。尽管如此，稽胡在与北朝隋唐的交往中，上层人士不断走出吕梁山区，加入到官僚集团中。唐高宗时灭亡百济的主帅刘仁愿便是稽胡后裔，自称刘豹之后。刘豹是匈奴汉国建立者刘渊之父。稽胡的下层部众则被逐步编户齐民化。稽胡最后一次大规模起事是在唐高宗时期，他们拥立了“光明圣皇帝”，设置百官，但其政治动员方式却不再是宣扬身份认同，而是利用刘师佛信仰，这表明稽胡的内聚力业已趋于消散。严昊实地考察了稽胡所居的吕梁山区，发现该地仍分布着不少可汗庙，留存着刘曜、石勒的传说；黄土高原居民穿羊皮袄的习俗也是稽胡遗风；陕北民歌的渊源也与稽胡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都表明，虽然从中唐以后，稽胡不再以一个民族的身份出现，但是其文化仍然具有重要影响，汇入中华文明，成为我们今天重要的文化传统。

（作者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一虫一世界的文化意境

■冯闻文

陈涌海教授的《寻蟬记：书虫博物志》（以下简称《寻蟬记》）是一部专记书虫衣鱼的妙书，与《寻芸记：辟蠹芳草博物志》构成了一套组合。

虫，在古代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作为所有动物的通称。在妇好墓中就有螳螂、蝉等形象的玉蝉。而中国的玉蝉和埃及的圣甲虫一样，有着重生复育的特殊含义。陈涌海教授更是提及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中的“鸟飞兽走，能虫也；蛛网蛸丸，能天也，皆稟之造物，岂仿效之所致哉！”，将本书主旨提到了一定的高度。动物有动物的生存之道，是人所不能模拟的，就像爱默生《论自然》中写道的：“当你放开心灵去感受万物时，你会发现一切自然之物都像星辰那样，令人产生类似的感觉。大自然从不平凡。最聪明的智者也无法穷尽自然的秘密，不会因发现自然的完美而失去好奇心。”书虫虽小，细心详究同样也能格物致知。

威廉·布萊兹的《书之大敌》曾有专门的章节讨论书虫，他曾观察一本书的虫洞，记录其中每一页虫洞数量的变化，“在这本书里，书虫之间好像在进行某种比赛”，虽富有趣味，不过更多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

《寻蟬记》一书尤其可贵之处在于陈涌海教授的求真精神不仅仅基于长期积累的科学素养，更是一种旺盛好奇心的体现。比如在分析新加坡华文作家骆宾路《蠹鱼的遗嘱》时，小说诟病只读英文书、不读中文

书的现象，陈涌海教授注意到其写作背景：“新加坡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股取缔华文教育的风潮。那时主推华文教育的南洋大学被政府宣布停办，此后就再没有用华文授课的学校，学校和社会都力推英文，家庭平时的主要用语也从中文变成了英文，更不用说报刊书籍了。”其分析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文本批评上，读者得以借此了解小说中蠹鱼喻体的功能，并非食古泥古，而是文化乡愁。在解读覃字时，作者就注意到了李旭昇老师的考证文章，并进一步寻求其他文献作为依据。在解释覃草时，又注意征引传统医药学文献。这种为了解决问题而产生的跨学科视野，正是囿于单一学科范式的学术文本所难得一见的，这也是阅读此书能够给求知者的一种启发。看书并不仅仅在于习得他人求知的结果，而在于学习如何越过学科畛域求得真知。

尤为有趣的是书中提到的对于蠹痕的欣赏，列举了清代人因藏书被蠹蚀成蝶形而写作诗歌的风雅之事。这也让人联想到《语石》中提及刻意猛击而损的碑石带给人的感受，“字之四面空地皆不损，惟每字陷一坎窞，模糊不辨，望之如一行白鹭，又如成团白蝴蝶”，实际上都是因为知识阶层对于文字之物的过于喜爱，基于长期观察、欣赏而兴发起的特殊趣味。书中还提及现代艺术家也注意到蠹痕之美，如陈琦的《时间简谱·白书》、江超的《蠹简》水印木刻作品、朱赢椿的《虫子书》《虫子诗》等，这也体

现出了作者广博的学术视野和独特的艺术品位。

此外，陈涌海教授还注意到古人在书画造伪时对于蠹痕的伪造现象。《遵生八笺》中提及伪造宋版书虫洞，“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而基于传统书面的装帧形式，相邻页面的蠹痕往往呈现出一一对应关系。传奇小说中，人们据此对文书契据等进行辨伪。一个实际的鉴宝案例则是2013年由上海藏家刘益谦购回的《功甫帖》遭到美国物理学者王朴仁的质疑，其依据同样是蠹痕应有对应关联，而这与实物中蠹蚀的孔洞全不对应。

《寻蟬记》中多有论及真和美的相关性。梁启超《美术与科学》就讲到“密斯忒阿特、密斯忒赛因士，他们哥儿俩，有一位共同的娘，娘叫什么名字？叫作密斯忒奈渣，翻成中国话，叫作‘自然夫人’”。艺术和科学有共同的母亲——自然。比如在《寻蟬记》中讨论了衣鱼呈现银灰色光泽的原因，自罗伯特·胡克的博物学名著《显微图集》（1665年）到诺曼·希金的《书虫：书籍之害虫》（1985年），均认为衣鱼的光泽来自鳞片。陈涌海教授介绍了2001年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衣鱼外骨骼表层中有双喇叭多层结构，中间叠层厚度大，而两边厚度逐渐减小，这种结构可以产生全光谱的反射，呈现白色金属光泽。这种金属光泽属于结构色彩，会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变化。而衣鱼鳞片，中国古代就将

之用于制作类同云母的纸张。陈涌海教授还注意到《酉阳杂俎》中提及的关于衣鱼鳞片的另一用途：“近佛画中有天藏菩萨、地藏菩萨，近明帝观之，规影练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鲋鱼设色，则近目有光。”这会让人联想到现代人也会使用一些动物源色素，比如胭脂虫、紫胶虫等。《酉阳杂俎》的小故事也会让人想到桃金吉丁虫。奈良法隆寺中的日本国宝——“玉虫厨子”，玉虫指的就是桃金吉丁虫，玉虫厨子乃是一个用吉丁虫鞘翅装饰的佛龕，这和《酉阳杂俎》中衣鱼用于佛画可以说有相似处，但仔细想想，似乎违背了宗教的爱生护生之意。

不同于文史类书籍的写法，陈涌海教授在分析很多问题时都带有科学家的探索眼光，比如分析诗歌中蠹鱼何以被比作秦火余灰，作者谓：“写成化学式大概是这样，左边是纤维素（或淀粉）加氧气，箭头号，右边是二氧化碳、水和能量；如果是不完全的消化，则产物中会有炭。”因为缺乏水分造成不完全消化，导致秦灰和蠹鱼屎之间的相似性。我们在介绍火的科普书籍中，也能看到其将动物的消化过程比作燃烧，其实这正是有一种对于自然现象的深度洞察。罗伯特·胡克也曾赞叹书虫：“天地造化将生命之火存于生灵之体，食物入胃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滋补。”就像杨振宁所说的那样，科学和文学同样需要想象与妙悟。

《寻蟬记：书虫博物志》
陈涌海 著
商务印书馆

于微末窥深致

■袁恒雷

十余年前，当我读到一本散文杂志的栏目导语时，颇为共鸣，其说道：“文章虽短，给你的是整个世界。”我觉得这句话，对于给小小说定位同样适用。

小小说也称为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等，其显著特点是篇幅短小、人物少、故事情节简单，只截取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进行横断面的描写。在如此短平快的要求下，作者务必在极为节省的篇章里把这个片段或场景写得出彩，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对作者的要求之高可想而知。以至于阿·托尔斯泰有名言称：“小小说是训练作家最好的学校。”当我读到朱华胜小小说集《化成一朵雪花的人》时，我深以为然，朱华胜一篇篇短小精悍的佳作，再次彰显了见微知著的小小说魅力。

朱华胜扎根边疆地区，多年来笔耕不辍，已创作出数百篇小小说，本书选取了其中的一百篇成册。翻看本书会发现，他的创作题材多样，有乡村振兴类、乡土爱情类、历史传奇类、战争英雄类等。可见他是名寻求不断突破、不断超越自我的作家，而不是墨守成规，在已经建立的自我王国中裹足不前。

在如此丰富的创作类型中，朱华胜均有较为上乘的代表作。不过对于我这样一位读者与评者而言，若说其真的能够打动我的，当属其展现乡村青年男女交往的作品。我想这与他对当地农村生活熟悉，对男女青年情感观察仔细、体味颇深有关。比如《三只眼》，主人公林石安是当地的大学生村官，在其带领下，当地不仅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人畜饮水问题，还“引导村民种上了草莓、魔

芋，人均收入翻了好几番”。村里还办了爱心超市，“勤劳致富、遵守村规的村民可以凭借积分兑换各种物品”。这样一个富于智慧的激励机制，让村民的整体素质大幅提升，村风村貌得到巨大改变。

这一切，被一位叫李英的年轻姑娘看在眼里，她对这位勤劳上进、德才兼备的好青年芳心暗许。尤其是林石安为她的母亲寻来良医，治好了李母的眼疾，更是让李英意识到，这就是自己一直等待的人。若小说按照这个步骤发展下去，一对青年在一起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作品讲究“起承转合”，林石安由于工作能力突出，被调往另一个村子工作，这构成一对青年的第一重考验。本文的峰回路转之处在于，当女孩拦住即将赴任的林石安表白时，林石安说：“我可只有一只眼。”林石安因公受伤导致一只眼失明，他自然也是爱着李英的，因为作者描述此时林石安的心情是“他心颤，如海潮席卷”。女孩立即回复道：“不，你还有三只。”铿锵有力的短句点明了题旨——我是你的眼，多么动人真挚的告白。

全文不过千余字，却让一个朴实无华的乡村爱情故事展现得生动真实。而这样展现人物人性美好的佳作有很多，是朱华胜众多作品中尤为成功的。朱华胜之所以能创作出诸多作品且广受赞誉，在于其能够及时把握时代变革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准确捕捉现实生活中美中的闪光点，使读者在极短时间内获得某种有益的感悟与启发，这在“短微”时代尤其可贵。

《化成一朵雪花的人》
朱华胜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